



小额信贷在中国

—— 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发展史

《小额信贷在中国》丛书编委会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小额信贷在中国

——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发展史

《小额信贷在中国》丛书编委会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发展史 / 《小额信贷在中国》编委会编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3

(小额信贷在中国; 1)

ISBN 978 - 7 - 5095 - 4343 - 6

I. ①中… II. ①小… III. ①农业贷款 - 经济史 - 中国 IV. ①F832.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2022 号

责任编辑: 王 颀

责任校对: 王 英

封面设计: 郁 佳 丁亚青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960 毫米 16 开 81.5 印张 1 550 000 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5.00 元 (共五册)

ISBN 978 - 7 - 5095 - 4343 - 6/F · 3524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反盗版举报热线: 88190492、88190446

《小额信贷在中国》丛书编委会

顾 问：段应碧 陈开枝 江绍高

主 编：何道峰

副 主 编：王行最 刘文奎 刘冬文

编 委：潘席龙 王光龙 焦瑾璞 吴国宝 康晓光

冯 利 程恩江 何雪峰 张天潘 李 响

陈建利 王静艳 李 真 苏配柚 宋芳晖

编写说明

本丛书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专家编写，其中，《国际实践中的小额信贷》由潘席龙、王光龙编写，《农村信贷配给与小额信贷体系建设》由焦瑾璞编写，《艰难前行的公益小额信贷》由吴国宝编写，《以小额信贷促进社会公平》由康晓光、冯利、程恩江编写，《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发展史》由何雪峰、张天潘、李响、陈建利编写。

总 序

小额信贷这个概念始于哥伦比亚和美国非盈利组织的微型金融公益探索。因为尤努斯在孟加拉乡村穷人银行大规模扶贫的成功试验，使其具有了鲜活的、与传统银行信贷业务完全不同的金融创新意义。它对传统信贷的创新达到了颠覆的程度，主要体现在：认为穷人是具有信用和有能力的，因此可以作为正规金融服务细分市场的潜在客户，银行可以服务此类客户从而摒弃令人憎恶的嫌贫爱富形象；给这群客户提供服务可以不用传统金融信贷的项目风险评估、财产抵押和信用担保工具，而使用贷款成员组织的评估和相互信用保证工具，来达到控制信贷风险、保证还贷的目的；可以在令人憎恶的高利贷和大额贷款利率之间找到一个理性的利率区间，使得到服务的穷人和信贷机构找到双方均可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平衡点，而不是将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对服务对象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似的高利贷上。小额信贷的金融创新还同时带来了扶贫公益的创新，即原有的扶贫公益更多地通过赠予来推动受益贫困人群状况的改善和减贫，而小额信贷则开启了通过信贷服务跟穷人进行平等交易的经营性扶贫大门。这种方式把穷人从受扶助的弱者位置一下拉到了与资助者完全平等的合约地位，给穷人施加还款信用压力的同时也给他们注入了自立自强的勇气和信心。通过培训、互动、交流、经营、销售、还款、算账、再贷款的持续，这场扶助使受助穷人通过“干中学”的行为模式得到了能力的成长和提升，因而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并摆脱贫困。正是这种金融创新和扶贫公益创新，使小额信贷实践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近二十年间，在国际公益扶贫舞台上大显身手，也使小额信贷这个概念在金融领域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和内涵。尤努斯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的小额信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主要经由两种方式探索：其一是非盈利组织推动的扶贫公益小额信贷探索；其二是 90 年代末期政府拿出 50 亿委托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进行扶贫小额信贷探索。第一种方式因为缺乏法

律和资金支持而发展缓慢；第二种方式则因为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兼容小额信贷业务的机制与内生动力导致还款率低下，且没有社会问责，最后不了了之。最近几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及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演绎出了一幅小额贷款公司蓬勃发展的图景。2009年中国的小额信贷公司迅速崛起，特别是2011—2012年因资金通过国有银行流入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后，在民营企业资金奇缺、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三重夹击之下，信贷需求陡涨，小额贷款公司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飞速发展。2011年全国小贷公司发展达到4,200多家，资本金3,000亿元，贷款余额3,900多亿元；2012年全国小贷公司发展达到6,000多家，资本金5,000亿元，贷款余额6,000多亿元。同时，农村信用社宣称其小额信贷的业务已达到6,500亿元，农业银行小额信贷超过1,000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小额信贷有700多亿元，邮储银行小额信贷超过2,000亿元，村镇银行小额贷款规模接近千亿元。从这些数字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全世界小额信贷后来居上的国家，迅速崛起，飞速发展，很快就解决了小额信贷的普及问题。

但是，这些统计数据都不来自独立第三方，全是当事人自身发布的，因此概念边界、统计口径、数据真实性、数据背后的可比性等都存在一些问题，无法进行可靠的认定、比较和衡量。我们显然也不能轻率地因这些数据而得出上述结论。

问题出在哪里？除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外，最大的问题是概念边界。什么是小额信贷，这是有普世定义的，即针对穷人的、含有扶贫公益性质的金融信贷创新。另外，一个很直接的概念就是单笔贷款规模。按照国际上一个通常的共识，单笔贷款规模不大于人均GDP两倍的，可算作小额信贷范畴。那么，中国小额信贷的贷款额度界限是多少？中国小额信贷运作方式又是否符合小额信贷的国际规范？显然，现在所说的那些数据肯定不是在同一范畴或同一可比标准之下的。小额贷款公司所谓小额信贷平均单笔贷款规模超过150万元，且单笔规模呈逐年快速提升趋势，最大的单笔贷款已超过2,000万元；信用社所谓小额信贷是指单笔贷款为30万元，农业银行单笔贷款则为30万元。而非盈利组织讲的小额信贷可能是单笔几千元，1万元等。这样一些数字放在一起，能得出国际通行的小额信贷可比概念下的发展状况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状况？就小额贷款公司而言，主要是因为“23号文”所定的两个关键性政策变量：其一是小额贷款公司利率可以突破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上不封顶（司法解释是不超过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其二是小额贷款公司单笔贷款最高限额不超过注册资本金的5%。这两个政策变量吸引资本

创办小额贷款公司并提升注册资本金。就某些国有银行而言，因为国际通行的小额信贷代表着扶贫和服务“三农”，这符合中央政府倡导的政策，所以在统计和上报业绩时倾向于增大小额信贷数据，以体现其服务“三农”的政绩，其行为取向也十分清楚。

当然很多人可能认为，大额度贷款对中小企业也很有价值，因此概念可以宽泛，不必让小额信贷的概念这么窄。中国的中小企业确实需要贷款扶持，很多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更是无可非议。但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问题：其一是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其二是小额信贷是否排斥农村中小企业贷款。就像人类创造了“家禽”概念，是因为它有有别于其他“家畜”的特征，我们不能因为“小猪”和“小牛”存在饲料需要就把它们统计到“家禽”中来。科学的发展依赖于分类的严格，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新的发明和发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在于政策所针对对象的科学分类和严格定义，混淆了分类和定义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和制定出理性的引导政策。

面对小额信贷的现状，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和讨论，以使行业找到跟国际接轨的、在同一种语境中的交流语言和行业标准。正本清源，才能找到理性的行业政策扶持与监管方法，否则被无限宽泛化的“小额信贷”概念会鸠占鹊巢，形成政策误导，掩盖了低收入人群的自立扶贫和金融服务需求，避免用解决农村问题来掩盖农业问题、用解决农业问题来掩盖农民问题、用解决富裕农民的问题来掩盖低收入农民问题。若形成宽泛的小额信贷概念，而政府出台的小额信贷政策又不鼓励机构去做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那么，国际通行的小额信贷渠道会被中小企业贷款占据。为什么要把事情搞成如此局面？为什么要掺杂人为的混淆？在这样含混复杂的系统中又如何导入差别化的资金和利率管理、税收优惠、风险监管等政策措施？针对这些措施我们期待什么样的政策结果？不同的小额信贷运营主体应如何认识、面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并改进之？

正是为了理清小额信贷行业的上述问题，并寻求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出版了《小额信贷在中国》。该套书委托业内专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与调查研究。这些专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从事农村金融研究与政策制定的焦瑾璞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非盈利组织及行业研究的康晓光教授、世界银行长期从事小额信贷研究与咨询的资深研究员程思江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非盈利组织与小额信贷研究的吴国宝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长期从事国际小额信贷研究的潘席龙教授，以及《南方都市报》资深记者和编辑何雪峰先生。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这套书呈现出来，其中包括：焦瑾璞先生及其团队的《农村信贷配给与小额信贷

体系建设》、康晓光先生和程恩江先生合作的《以小额信贷促进社会公平》、吴国宝先生及其团队的《艰难前行的公益小额信贷》、潘席龙先生的《国际实践中的小额信贷》以及何雪峰先生及其团队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发展史》。

这些研究所体现的是这些专家观察和理解中国小额信贷领域现状与问题的不同视角。不同的视角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是很正常的，而且正是这些不同的理解才会产生差异化和思想碰撞。作为发起和资助人，中国扶贫基金会无法对上述专家的研究作专业性评价，但我们相信这些从该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库中筛选出的专家的能力和水平。他们具有独立思想和意志，研究方法严谨，注重调查研究结果，具有高深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学术造诣。相信他们的研究、著述和观点能引起各方的关注和深入讨论，引发更深刻的发问、思辨以及进一步的研究，从而推动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理性思考，推动合理政策的出台，推动行业的治理改进，从而改变现状，理性发展。

为此，我谨代表资助方感谢参与该项研究的所有学者及其研究助手，是他们的独立思考、深入调研与辛勤劳作成就了这套书，让我们能在万马奔腾、泥沙俱下的蓬勃发展冷静下来，分享独立观察与自由思考的盛宴，让我们全力奔跑时停下脚步回望印在沙滩上的串串脚印，从而引发我们的互动、思考与校正；同时，我也要感谢美国如新集团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是他们的慷慨资助才使研究和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仁王行最、刘文奎，还有刘冬文、王静艳及其团队，是他们的努力与执行力使这套书得以面世。最后，感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同志，是他们做了无数细致而琐碎的编校工作，才保证了这套书的出版质量。

研究是为了深入思考，思考是为了改变我们的行动，行动是为了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是为了影响和改变世界。让我们为小额信贷行业正能量的积累以及行业的健康理性发展而祈福！

何道峰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

2013年2月22日

前 言

用笨人的方法不断往前推进

何道峰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中和农信董事长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能够取得成功。一种人是因为脑子比较灵活。由于脑子很好使、很聪明，所以一下子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抓住机遇有可能他就成功了。还有一种人属于比较傻的笨人，这种人就靠坚持一个想法，虽然有点傻，不会迅速跑起来，但是每天挪一小步，挪了很多步以后就发现挪了一大步，再过了十年以后，就可以跑上几步了，因此也取得一些成功，这是笨人的成功之道。

我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同行们属于第二类人，虽然有点傻但是能够长期坚持。所以我们的理念和信条就是，未来永远属于那些胸怀理想并坚持不懈努力的人，有一种成功应该属于那些能坚持的笨人。这也是尤努斯开创的小额信贷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尤努斯并不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实践家。1976年他在孟加拉达卡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当时达卡大学里牛群和大学生混在一起，每到晚上牛群就进了校园。有一次，尤努斯走出校园，发现当地农民非常穷，因为95%的土地掌握在5%的地主手里，于是95%的农民变成了佃农，租金交完以后，基本上就身无分文了。他发现一个契机，如果借给农民尤其是妇女一点钱，让她做点小竹凳子去卖，卖小竹凳的钱比她种地收入高得多。所以他拿出27美元，贷给了42名妇女。当时也没什么机构，就是和农户们口头约定，也没有签过合同，就把钱借给她们了，最后借款者也都如期还了款。这给了尤努斯一个很大的启发，颠覆了他脑子里的经济学理念。

这个理念是什么呢？按照银行的传统说法，穷人是非理性的，是不讲信用用的，所以不能把钱贷给穷人，要贷给富人。这是一个传统的观念，但尤努

斯发现这个观念错了，认为穷人是讲信用的，于是就从27美元起家，开创了小额信贷之路。经过了3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创建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现在已经发展到800万个农户客户，积累了60亿美元的资本金。他为人类解除贫困及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根据某国际组织的调查，全球有40%的人口无法享受正规的金融机构服务。在工作年龄人口里，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口比率分别为：印度40%，墨西哥76%，菲律宾80%，巴西57%，波兰25%，俄罗斯38%，英国10%。这个数据表明，从银行贷不到款的人占非常大的比例。我们手头没有我国准确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商业银行业务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涉足应该是非常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低收入人群是得不到银行金融服务的。这件事情就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的起因。所以1996年我在做世界银行项目的时候，就主动介入小额信贷项目。从一开始，我就给项目设立三大目标：第一，为真正的穷人提供贷款支持，项目的目标客户是得不到银行贷款的低收入人群；第二，不仅仅是提供贷款，还要提供贷款农户自立和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服务，这就要通过项目培训，通过农户在项目小组以及中心会议的互动、互助来提升他（她）们的能力；第三，要实现操作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坚守这个原则，在不断地用笨人的方法往前推进我们的小额信贷项目业务。

我们的小额信贷项目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96—1998年是探索阶段；1999—2004年是初步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是创新发展阶段。

1996—1998年，我在陕西省安康市和四川省阆中市两个县开始了小额信贷的实验。这一阶段，初步建立了项目实施的理念、操作规则、技术方法和流程，摸索出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催生了中国的小额信贷业务，实现中国山水间百姓银行的梦想。

1999年，我到中国扶贫基金会任职，该项目也随之转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直至2004年，项目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既经历了令人兴奋的发展小高潮，同时也经历了令人沮丧的发展困境和回落，项目区最多时发展到10个县，最后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关闭或撤出一半以上的项目区，其中就包括我最初建立的安康、阆中两个项目区。我们当时遇到项目资金来源缺乏和项目管理体制不清两大难题。中国扶贫基金会会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既没有钱，也没有权，我们不能给各省、各县扶贫办发文件说你们拿出钱来让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小额信贷吧？没有钱怎么做这种项目？另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按照国家的规定，是不可以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所以只能在当地注册一个机构（县农户自立能力建设

支持性服务社，简称“服务社”），这个机构归口在县里面，但交给中国扶贫基金会来运作。但这就出现了双重管理，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地方政府双重的领导，项目操作机构的县服务社主任反而因此钻了空子，谁的指令对他有利他就听谁的。当然，他离当地政府近，对地方政府的指令听得还多一些，对基金会指令的执行就打折扣了，甚至采取敷衍、欺瞒策略，监管考核都没法做。2000年以后，项目管理一直在下滑，项目区出现不少问题，到2004年，整个项目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针对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我们只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找到各地的扶贫办主任，看他们想不想干这事，对我们感不感兴趣，有一个感兴趣，就找一个去谈，有两个感兴趣，就找两个去谈，不感兴趣就不跟他谈。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就在省扶贫办主任里面找那些认同我们理念的人。结果我们找到了福建省扶贫办的林月婵主任，辽宁省扶贫办的柴久凤主任，还有河北省扶贫办的扈双龙主任。他们敢于把理解和信任放到中国扶贫基金会身上，突破了常规，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把省扶贫资金拿出来，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管理，在各自省里开展小额信贷。就这样，项目保住了，并且一年年好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我和基金会的同事们都是感受深刻的，尽管后来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困扰我们的资金和管理体制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形势越来越好，但我们始终都铭记着那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共同的理念和事业而与我们携手共进的人们！

天下事，坚持就可能有机转。2005年，中央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新的管理条例修改了原来的规定，允许中国扶贫基金会这类慈善组织经过一定的申报批准程序，在国内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这就从法律角度解开了我们无法在项目区设立独立的管理机构的症结，为项目的顺利发展带来很大的转机。

2005年，我们将项目管理进行了改制，把县里面的小额信贷项目管理机构，统统注册成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全部人马都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正式员工。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机构、两条指令的问题。地方政府转变为监督的角色，项目管理委托给中国扶贫基金会来做，这样关系就摆正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才能走到今天，取得了好的成绩。当然，也不是说有了这个体制，其他问题就能自动解决，我们必须做锲而不舍的努力，必须坚持艰苦细致的工作，必须做标准化的工作，一点点练内功。笨人的方法不是靠聪明劲，而是靠笨功，就像蜘蛛织网，每天织一小段，几天后就是一张很美的八卦图。

回顾我们开展小额信贷十六年坎坷、艰辛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能够前行

并取得一定的成功，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在坚持，在维护我们的信条。

第一个信条：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第二个信条：穷人是最讲信用的，说穷人不讲信用是不公平的。中华民族一直尊崇一个基本道理：欠债还钱。这个理念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毛细血管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认同的。

第三个信条：我们相信每个穷人都是企业家。他们都会算账，知道什么赚钱什么不赚钱，收入减支出等于毛利，再扣除费用等于利润，比尔·盖茨也不过是这样算加减法的，一个农民与一个企业家没什么不同。

第四个信条：我们深信赠款和贴息会让富人搭上穷人的便车，而真正的穷人得不到实惠。这个理念我经常与各省扶贫办主任进行沟通。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发现了交易成本：当一个物品的价格比实际的市场价格要低很多时，那么得到这个物品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便宜，低利息就是这样物品。为了占到这便宜，人们就会去送礼行贿，用各种手段，这就是科斯揭示交易成本的核心。赠款和贴息恰恰容易产生这个问题。

第五个信条：我们相信贷款足以改变穷人的一生，使他们的生命闪光。为了还贷款，他就必须要用这笔钱去推动一件事情的发展，得出来的结果比投进去的东西要大，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的琢磨，让人最后有能力、有技巧、有成功、有自信。这种改变绝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我们中和农信人用汗水和生命写出来的。

这五个信条也是我们的理想。17年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坚定不移，决不放弃，坚持走到了今天，在中国小额信贷的艰难发展过程中没有倒下，我们做到了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下一步我们要把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发展成为金融公司，最后发展成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乡村银行，成为为穷人服务的山水间的百姓银行，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乡间信贷的光明使者	(1)
第一节 应运而生的中和农信	(1)
第二节 中和农信的培育者	(2)
第三节 中和农信的开拓者	(6)
第二章 阳光的阶梯：百姓银行的四次跨越	(16)
第一节 模式探索与积累经验（1996—1999 年）	(16)
第二节 初次扩张与双重管理困局（2000—2004 年）	(26)
第三节 创新改制与体系成熟（2005—2008 年）	(41)
第四节 专业转型与公司化管理（2009 年至今）	(58)
第三章 阳光下的百姓故事	(81)
第一节 福建福安：让少量的钱发挥大作用	(81)
第二节 福建霞浦：小额信贷的探索者	(91)
第三节 辽宁康平：十个点都不换	(100)
第四节 辽宁新宾：不吃饭不收礼的优良作风	(112)
第五节 河北平泉：农户自立谋求发展	(124)
第四章 成功之道	(135)

第一章 乡村信贷的光明使者

第一节 应运而生的中和农信

20 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领域和消除贫困事业领域，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他发起的小额信贷扶贫方式在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引发了小额信贷的浪潮。穆罕默德·尤努斯及他创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译作格莱珉银行）于 2006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促使更多的国家和有志之士将小额信贷作为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中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重要方法。三十年间，无数的小额信贷组织、机构按照尤努斯创建的模式，进行着自己的小额信贷实践，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小额信贷热潮至今方兴未艾。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学者从尤努斯及孟加拉乡村银行那里引入小额信贷理念、方法，并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开始进行试验。其后，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也在中国开展了小额信贷。这种扶贫模式很快就被政府和公益慈善机构所了解和认同，并在全国贫困地区广泛推广。90 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发布了支持小额信贷的政策，地方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也都纷纷出台了开展小额信贷的措施，90 年代中后期，小额信贷热开始在中国兴起，不少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小额信贷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公益慈善界也出现了不少推广和实施小额信贷项目的机构和组织。

在中国产生并发展小额信贷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在中国的小额信贷活动中，除了大量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外，也出现过数百个公益慈善界组织和机构。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或组织拿出了令人信服的事实，说明小额信贷这种模式在中国贫困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显著作用，也没有一个机构作出了可以与孟加拉乡村银行相媲美的业绩。

然而，我们透过数千个小额信贷机构组成的中国小额信贷丛林的缝隙，却可以发现，在中国贫困农村的大地上，生长着一枝小额信贷的奇葩，它就

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全资组建的、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小额信贷的专业机构。中和农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末。1996 年，时任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的何道峰，在世界银行贷款秦巴山区扶贫项目中创设了小额信贷项目。1999 年，随着何道峰就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小额信贷项目转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成立小额信贷项目部。2008 年，小额信贷项目部转制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到 2011 年底，中和农信成为业务遍及 13 个省、53 个县级分支机构，员工人数超过 700 人，年放款总额超过 10 亿元，客户超过 11 万户的机构。

目前，中和农信已经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

第二节 中和农信的培育者

中和农信这枝奇葩是众多的有志之士在 17 年的时间里，用理想、智慧、勇气、辛勤之水浇灌、培育而成的。

中和农信的创始者是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

1996 年，时任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的何道峰，在完成了将中国西部 30 万农民有组织地输送到东部、南部发达地区就业的世界银行贷款扶贫项目任务后，他敏锐地看到，尤努斯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经验也适合中国的扶贫和农村发展需要。因此，他在世界银行贷款秦巴山区扶贫项目中创设了小额信贷项目，建立了陕西安康和四川阆中两个项目区。1999 年，何道峰就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也将他苦心创造的小额信贷项目转入基金会，从此开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2000 年以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公益慈善领域中声名鹊起，成为中国最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公益慈善机构之一。其创设开展的“母婴平安 120 项目”、“新长城贫困大学生自强项目”、“爱心包裹项目”、“紧急救援项目”等，因其广泛动员公众参与的性质而为社会公众所了解和认知。但小额信贷项目和中和农信除了业内人士有所了解和产生一定影响外，广大的社会公众对这支“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奇葩却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小额信贷项目和中和农信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创立最早、投入最大、成就最高、意义最为深远的项目，它凝聚着基金会全体领导和员工的理想和心血，不仅对中国的扶贫事业发展，也对机构自身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从1999年何道峰把小额信贷项目带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后，这个项目就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历届会长关注和指导的首要工作。从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任会长王郁昭开始，到现任会长段应碧、副会长何道峰、陈开枝、江绍高、王行最，他们不仅在小额信贷项目发展战略的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且在促成政府政策改变、高层领导协调、国际国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历任会长们都曾深入到小额信贷项目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并对最基层的工作进行实际指导。曾担任过基金会秘书长的何道峰、王行最，更是亲自参与了项目实施中具体管理问题的解决。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的成就，是中国扶贫基金会领导集团集体智慧和决策能力的体现。

小额信贷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其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在遵循“改革创新”方针，走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道路时的第一块试验田。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的何道峰，在这块试验田里，手把手地教会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管理层和员工如何调研策划和管理实施一个项目。正是这种具体的培训，彻底转变了基金会原有的简单粗陋的“泛扶贫”工作方式，产生了新的工作规范，使之走上了精细化项目管理的道路，它不仅仅奠定了中和农信今日辉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基金会十年腾飞的基础。在这块试验田中，经过何道峰的精心培训，也成长出一大批项目管理人才，成为基金会宝贵的人力资源，走上了基金会中高层管理岗位。其中，现任秘书长刘文奎、副秘书长杨青海、副秘书长兼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原副秘书长耿和荪、秘书长助理王军、秦伟、原资讯监测研究部主任柏铮、“母婴平安120”项目部主任黄陆川、国际合作部主任伍鹏、中和农信副总经理苏配柚、项目合作部主任助理郑建国、资讯监测研究部处长石克明等，均担任过小额信贷项目的管理人员。

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是和国务院扶贫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有的项目区均设在国家和省的扶贫工作重点县。因此，中和农信的成长发展也是国务院扶贫办历任领导的关心、支持和扶助的结果。早在1996年，何道峰在世界银行秦巴扶贫项目中创立的小额信贷项目，就是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协调下得以开展的。项目转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后，同样受到扶贫办的关注和支持。扶贫办原任主任刘坚、副主任高鸿宾，现任主任范小建、副主任王国良、郑文凯以及相关部门和领导，对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项目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积极与国家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国家金融机构为基金会争取特殊政策和资金支持，在协调相关省、市、县扶贫办与基金会合作开展小额信贷项目方面，给予中国扶贫基金会宝贵的信任和支持。中和农信目前所在的13个省的53个分支机构，其合作伙伴就是各项目省、市、县